翻譯西學義理之淵海

耶穌會士金尼閣與《西儒耳目資》

周維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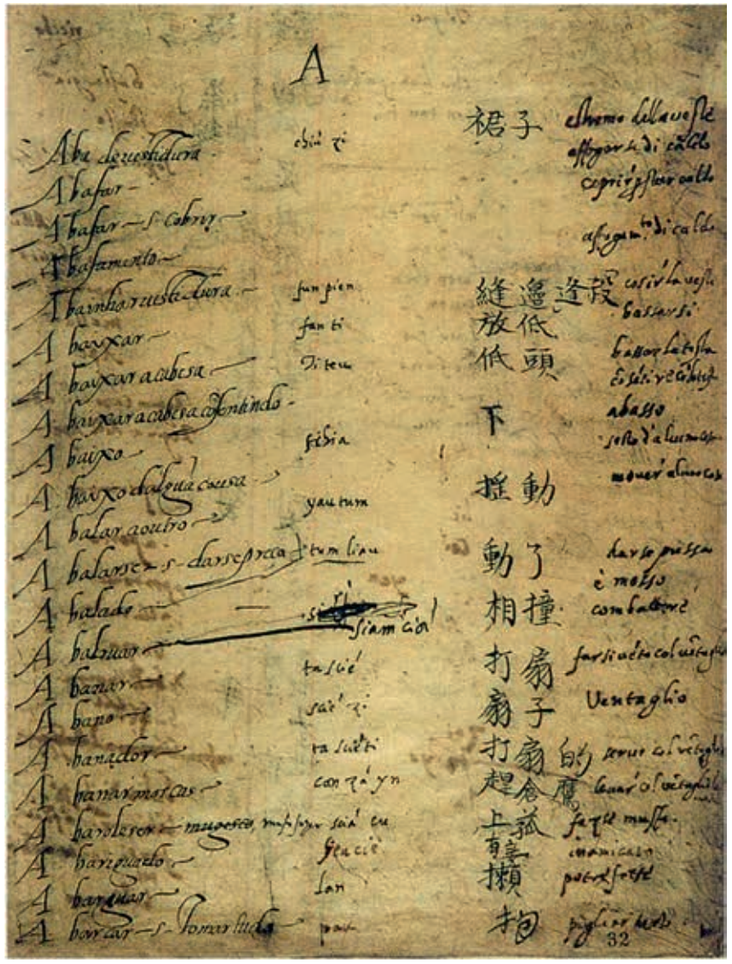
明末耶穌會士沙勿略（St. Francois Xavier, 1506-1552, S. J.）等浮海而來，企盼能將福音傳到中國，使華人也能成爲上帝的子民。然而，複雜的方言，以及難懂的漢字，成爲他們開始傳播福音前最大的挑戰。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 S. J.）等博學的耶穌會士們，如何逐步掌握漢語，以配合知識傳教的策略？金尼閣（Nicolas Trigault, 1577-1629, S. J.）所著《西儒耳目資》，無疑是總結這一關鍵工作的代表性著作。

羅明堅和利瑪竇的《葡漢辭典》

十六世紀末期，爲了理解東方文化，並向東方傳播福音，學習漢語成爲耶穌會士非常重要的工作。漢語，特別是南京官話，是明末來華耶穌會士必須積極學習的語言。

一五七八年，耶穌會遠東觀察員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 1539-1606, S. J.）在澳門視察，指示傳教士們不但要學習粵語，也要學會官話，並要懂得書寫。一五七九年，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1543-1607, S. J.）奉范禮安的命令抵達澳門，他覺得漢語因爲沒有字母，字數又眾多，因此非常難學。但他仍然在兩年內認識了一萬二千多個漢字。（註一）

一五八二年，利瑪竇抵達澳門，由羅明堅教導漢語，一開始時，利瑪竇也覺得漢語難以學習，他提到「在發音上有很多同音而義異之字，許多話有近千個意義，除掉無數的發音外，尚有平上去入四聲」。（註二）因此，漢語中龐大數量的字和複雜的發音，成爲了傳教士入華傳教的最大障礙。



羅明堅和利瑪竇合寫了《葡漢辭典》　羅馬耶穌會檔案館藏

一五八三年九月，羅明堅和利瑪竇至廣東肇慶開教。在《利瑪竇中國札記》中，金尼閣多次記載了此一階段中傳教士逐步認識漢語特性的歷程：

所有中國的字詞無一例外都是單音字。我從未遇到過雙音字或多音字，雖然有些字可能包括兩個甚至三個元音，其中有些是雙元音。…中國人不習慣說元音和輔音，因爲每個字正好像每個對象一樣，都是用它自己的漢字或符號來表示的，用於代表一個意思。（《利瑪竇中國札記》，頁一七）

除了漢語單音濁體的特性外，當然，他們也開始了解到漢字聲韻問題的複雜性：

人們運用重音和聲調來解決我稱之爲含意不清或模稜兩可的困難問題。一共有五種不同的聲調或變音，非常難於掌握，區別很小而不易領會。他們用這些不同的聲調和變音來彌補他們缺乏清晰的聲音或語調；因而在我們只具有一種明確含義的一個單音節，在他們就至少具有五個不同意義，並且彼此由於發音時的聲調不同而可能相去有如南極和北極。每個發音的字的確切意義，是由它的聲調質量決定的。這就當然增加了學習說這種語言以及聽懂別人的困難。我要冒昧地說，沒有一種語言是像中國話那樣難於被外國人所學到的。然而，上帝保佑，我們耶穌會的會友凡是獻身於這個民族中的傳道工作的，都經過不懈的努力而學會了說他們的語言。從一開始佈道就在這裡的人，不僅可以流利地說，而且還可以讀和寫中文。我認爲中國語言含糊不清的性質，乃是因爲自古以來他們就一直把絕大的注意力放在

僊花寺遺址　作者攝

肇慶西江畔的崇禧塔與僊花寺遺址　作者攝

書面語的發展上，而不大關心口語。（《利瑪竇中國札記》，頁二一八—二一九）

除了不同省分的各種方言，也就是鄉音之外，還有一種整個帝國通用的口語，被稱爲「官話」，是民用和法庭用的官方語言。…懂得這種通用的語言，我們耶穌會的會友就的確沒有必要再去學他們工作所在的那個省份的方言了！（《利瑪竇中國札記》，頁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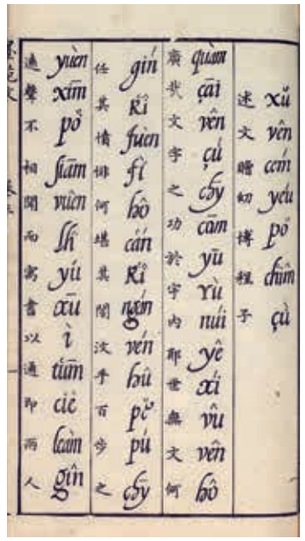
學習通行的南京官話雖減少了學習各種方言的負擔，但由於漢字並非表音文字，因此爲漢字注音十分必要，如此才能註記漢字的正確發音。一五八三年至一五八八年間，羅明堅和利瑪竇合寫了《葡漢辭典》，一九三四年經德禮賢（Pasquale D'Elia）神父在羅馬耶穌會檔案館發現。此書蒐集了六千餘個葡文詞彙，並對照出五四六一個漢語詞彙。（註二）此書也開創了以拉丁字母標注漢字讀音的先例。但《葡漢辭典》標注漢語語音的使用了多種西方語言系統，又沒有聲調系統，加上並未大量印刷出版，只能說是傳教士們的倉促應急之作。

利瑪竇《西字奇蹟》

一六〇〇年，利瑪竇居停山東臨清時，隨行的鍾鳴仁（Fernandez Sébastian, 1562-1622）、郭居靜（Lazzaro Cattaneo, 1560-1640）又協助發展完善了《葡漢辭典》：

鍾鳴仁擅長使用中國語言，由於他可貴的幫助，神父們利用這個時間編製一份中國詞彙，他們還編成另外幾套字詞表，我們的教士們學習語言時從中學習到了大量漢字。在觀察中他們注意到整個中國語言都是單音節組成，中國人用聲韻和音調來變化字義。不知道這些聲韻就產生語言混亂，幾乎不能進行交談，因爲沒有聲韻，談話的人就不能了解別人，也不能被別人了解。他們採用五種記號來區別所用的聲韻，使學者可以決定特別的聲韻而賦予它各種意義，因爲他們共有五聲。郭居靜神父對這個工作做了很大的貢獻。他是一個優秀的音樂家，善於分辨各種細微的聲韻變化，能很快辨明聲調的不同。善於聆聽音樂對於學習語言是個很大的幫助。這種以聲韻書寫的方法，是由我們兩個最早的耶穌會傳教士所創作的，現在仍被步他們後塵的人們所使用。（《利瑪竇中國札記》，頁三三六）

〈述文贈幼博程子〉末可見中文係利瑪竇自己用毛筆書寫，並蓋有兩種耶穌會的會徽印。


〈述文贈幼博程子〉　局部　引自程大約《程氏墨苑》
明萬曆滋蘭堂原刊本　縱31.7，橫18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太監馬堂曾將他所買的一名男孩，送給利瑪竇，因爲男孩的口齒清楚，可以教龐迪我神父純粹的南京話。（《利瑪竇中國札記》，頁三九一）

在這些基礎之下，利瑪竇等人逐漸的完善了對應漢語發音的系統，其具體的成果之一，就是利瑪竇的《西字奇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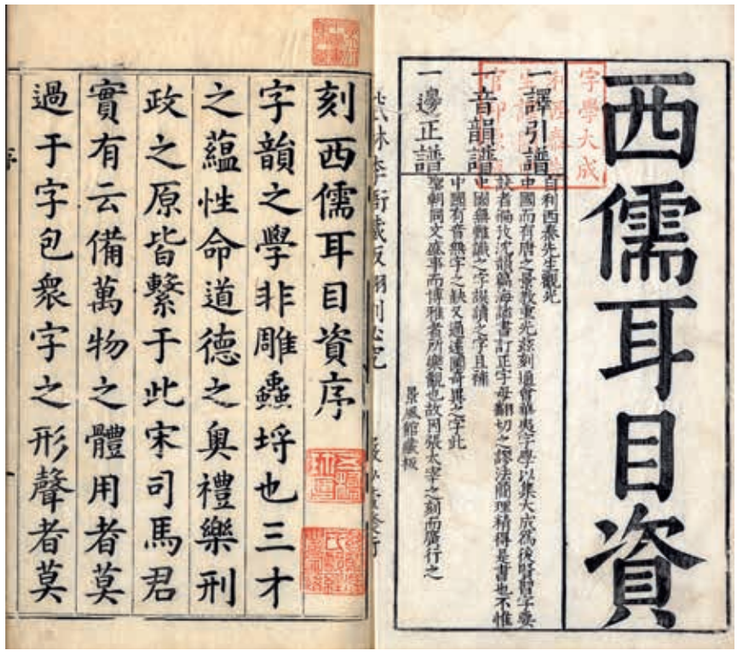
《西字奇蹟》被收錄於萬曆年間程大約所輯《程氏墨苑》中。程大約，字幼博，休寧人，明神宗萬曆時人，著名的刻書家。利瑪竇曾將他用羽毛筆（似爲鵝毛筆）書寫的四篇漢字注音文章和四幅圖贈程大約，程氏將之收錄於《程氏墨苑》中，共有〈述文贈幼博程子〉、〈信而步海疑而即沉〉、〈二徒聞實即捨空虛〉、〈婬色穢氣自速天火〉和〈天主〉。其中〈信而步海疑而即沉〉、〈二徒聞實即捨空虛〉、〈婬色穢氣自速天火〉三篇除注音文字外並配有圖畫，〈天主〉則爲聖母懷抱聖嬰圖。從內容分析可知，《西字奇蹟》是耶穌會士與中國士人交遊，及早期傳教文獻的代表。

《西字奇蹟》經分析共有一一五六個字，其中不同音的字有三八七個。經語言學家分析，共有二十六個聲母，四十四個韻母，四個次音字母，五個聲調符號和一個送氣音符號。其中五個聲調符號是很重要的改良，身兼音樂家的郭居靜和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 1571-1618, S. J.）神父對此有關鍵性的貢獻。不過由於字數太少，另一本在聲韻上更爲全面的書籍，對於傳教士來說十分迫切。這就爲金尼閣《西儒耳目資》的問世，創造了條件。

耶穌會士金尼閣與《西儒耳目資》

金尼閣，字四表，一五七七年出生於法國杜埃（Douai，當時屬西班牙帝國統治下的荷蘭）。一五九四年，入耶穌會。一六〇七年，赴印度。一六一〇年，抵澳門。一六一一年，經肇慶抵達南京。在南京時期，他與郭居靜和高一志（Alfonso Vagnoni, 1566-1640, S. J.）學習漢語。後因李之藻（？～一六三〇）所請，與郭居靜和鍾鳴仁在杭州傳教。萬曆四十一年（一六一三），金尼閣返回羅馬，至萬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返回中國，一方面在嘉定教漢語，又至陝西開拓教務，接著到杭州編纂書籍。在他與王徵（一五七一～一六四四）、呂維祺（一五八七～一六四一）和韓雲等人的幫助下，參照《洪武正韻》和《韻會小補》等中國韻書，編寫出了《西儒耳目資》。作於天啓五年（一六二五）夏，成於六年

耶穌會士金尼閣　引自網路



西儒耳目資

刻西儒耳目資序

字韻之學非雕蟲埒也三才之蘊性命道德之奧禮樂刑政之原皆繫于此宋司馬君實有云備萬物之體用者莫過于字包衆字之形聲者莫

金尼閣《西儒耳目資》　天啓丙寅秦涇王徵校刊本　縱28，橫17.4公分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一六二六）春，歷時五月，凡三易稿。其後，在吏部尚書張問達（一五五四～一六二五）的資助下出版。

利瑪竇在萬曆三十八年（一六一〇）去世，金尼閣是在他死後才抵達中國，而《西儒耳目資》是在利瑪竇去世之後十五年才出版時，隨同利瑪竇編修辭典的幾位中，龐迪我在一六一八年去世，鍾鳴仁也在一六二二年去世，碩果僅存的郭居靜則在杭州。由於金尼閣漢語師承郭居靜，又曾與鍾鳴仁在杭州傳教，故極有可能從兩人處得到了先前積累的漢語學習資料，因此得以其後在五個月中，快速完成編輯此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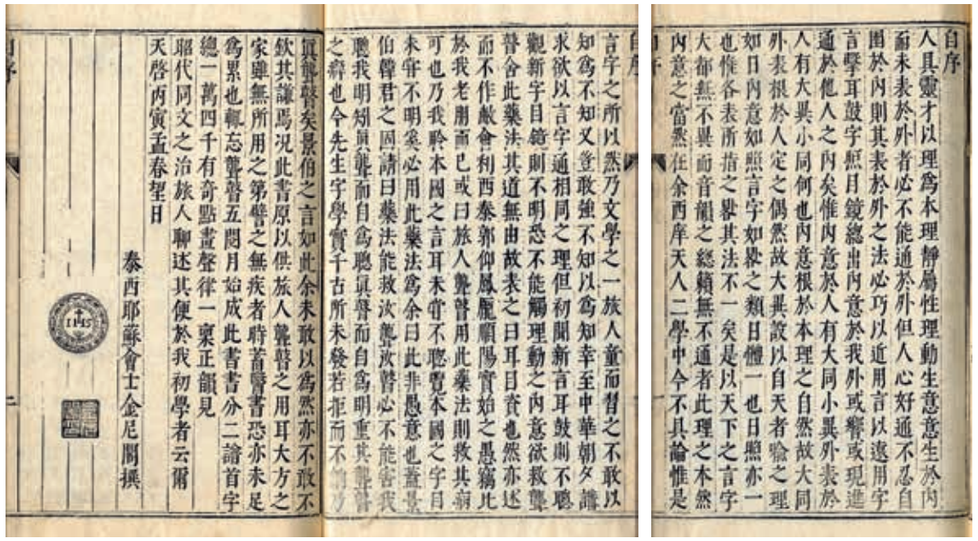
《西儒耳目資》爲誰而寫？

金尼閣在自序中稱：

> 幸至中華，朝夕講求，欲以言字通相同之理。但初聞新言，耳鼓則不聰；觀新字，目鏡則不明。恐不能觸理動之內意。欲救聾瞽，舍此藥法，其道無由，故表之曰《耳目資》也。然亦述而不作。敝會利西泰、郭仰鳳、龐順陽實始之愚，竊比於我老朋而已。

或曰：「旅人聾瞽用此藥法，則救其病可也，乃我聆本國之言，耳未嘗不聰，覽本國之字，目未嘗不明矣，奚必用此藥法爲？」余曰：「此非愚意也。蓋景伯韓君之固請」。曰：「藥法能救汝聾汝瞽，必不能害我聰我明，矧眞聾而自爲聰，眞瞽而自爲明，重其聾瞽之癖也？今先生字學實千古所未發。若拒而不納，乃眞聾瞽矣。」景伯之言如此，余未敢以爲然。亦不敢不欽其謙焉。況此書原以供旅人聾瞽之用，大方之家雖無所用之，第譬之無疾者時蓄醫書，恐亦未足爲累也。輒忘聾瞽，五閱月始成此書。書分二譜，首字總一萬四千有奇。點畫聲律，一稟《正韻》。見昭代同文之治。旅人聊述其便於我初學者云爾。

金尼閣在序中表達了此書是針對初到中國來的外國人所寫，因解決眼不識漢字，耳聽不懂漢語的問題，故將此書名爲《耳目資》。印刷出資者張問達之子張緟芳曾說「西儒入我中華，能噍閱此中文字，而輒洞曉其義意者，全資乎此。」（註四）可見此書對於傳教士學習漢語的重要性。



自序

人具靈才以理爲本理靜屬性理動生意意生於內而未表於外者必不能通於外但人心好通不忍自圉於內則其表於外之法必巧以近用言以遠用字言擊耳鼓字照目鏡總出內意於我外或響或現進通於他人之內矣惟內意於人有大同小異外表於人有大異小同何也內意根於本理之自然故大同外表根於人定之偶然故大異設以自天者喻之理如日內意如照言字如譬之類日體一也日照亦一也惟各表所指之譬其法不一矣是以天下之言字大都無不異而音韻之總籟無不通者此理之本然內意之當然在余西庠天人二學中今不具論惟是

言字之所以然乃文學之一旅人童而習之不敢以知爲不知又豈敢強不知以爲知幸至中華朝夕講求欲以言字通相同之理但初聞新言耳鼓則不聰觀新字目鏡則不明恐不能觸理動之內意欲救聾瞽舍此藥法其道無由故表之曰耳目資也然亦述而不作敝會利西泰郭仰鳳龐順陽實始之愚竊比於我老朋而已或曰旅人聾瞽用此藥法則救其病可也乃我聆本國之言耳未嘗不聰覽本國之字目未嘗不明奚必用此藥法爲余曰此非愚意也蓋景伯韓君之固請曰藥法能救汝聾汝瞽必不能害我聰我明矧眞聾而自爲聰眞瞽而自爲明重其聾瞽之癖也今先生字學實千古所未發若拒而不納乃眞聾瞽矣景伯之言如此余未敢以爲然亦不敢不欽其謙焉況此書原以供旅人聾瞽之用耳大方之家雖無所用之第譬之無疾者時蓄醫書恐亦未足爲累也輒忘聾瞽五閱月始成此書書分二譜首字總一萬四千有奇點畫聲律一稟正韻見昭代同文之治旅人聊述其便於我初學者云爾

天啓丙寅孟春望日

泰西耶蘇會士金尼閣撰

《西儒耳目資》的金尼閣自序

從書名來看，此書當無疑義，是爲了傳教士學習漢語而寫。然而，考究本書的序，則可發現此書不僅爲傳教士學習漢語所作。按此時入華之傳教士尚少，不足以構成消費購買此書的經濟規模。而本書的內容，又不完全出自金尼閣之手，從這幾個蹟證來看，《西儒耳目資》的讀者，確實不可能僅限於來華或是想要學習漢語的外國人。

金尼閣同時也預期了中國人對於出版一本西方人學習漢語工具書的疑惑，他先解釋出版此書，是出於韓雲的邀請。韓雲，山西平陽府絳州人，字景伯，萬曆四十年（一六一二）舉人，曾受業於徐光啓，對兵學有相當的認識，曾任徐州知州、漢中府推官和葭州知州。其父韓傑頗善經商，因此經濟生活甚爲豐足。韓雲家族信奉天主教，並邀請耶穌會士艾儒略、高一志等進入絳縣一帶開教，使得山西成爲天主教最爲活躍的地區之一。（註五）韓雲和其它支持刊刻此書的中國人士，無非是見到了《西儒耳目資》對於中國人學習聲韻學上的優點，才決定出版此書。

出資印此書的張問達在序中指出，他是藉由王徵得知此書。王徵，陝西涇陽人，字葵心，又字良甫，自號了一道人等，隨耶穌會士龐迪我入教，教名裴理伯（Philippe），天啓二年（一六二二）壬戌科進士。王徵向他推薦說：

> 此新訂西儒耳目資也。蓋泰西金四表先生所著。其學淵而邃博，大而有要。僅僅以二十五字母衍而成文。循韻直截簡易，絕無一毫勉強拘礙之弊。立總立全，分經分緯，才一縱橫交羅，而萬字萬韻無不悉備于其中也。倘先生所索元音之母天地自然之元韻非歟？

而張問達在翻閱後，認爲此書：

> 果如良甫所言，且多發前人之所未發，補諸家之所未補。至于聞音察母、檢畫知音之法，開卷便得其韻其字，恐從來無此奇捷。矧其書一遵《洪武正韻》尤可以昭同文之化；可以采萬國之風；可以破多方坟澁附會之誤。其裨益我字韻之學豈淺鮮哉！（註六）

夫西儒梯航遠來，學我華言，不數年間，輒能嘵曉此中文義，所通六經史傳，何啻數萬之字之音。今觀西號自鳴之母，號不過五，同鳴之父，號不過二十，及傳生諸母之攝統計之，才五十號耳，肯一記憶，一日可熟視。彼習等韻者三年尚不能熟，即熟矣，尋音尋字，尚多不得便遇者，誰難誰易，而反甘自遜爲？且余獨非此中人乎？閩愚特甚，一見西號，一二日中亦盡了了，又況聰明特達之士，高出萬萬者乎？……異日者，獻之聖天子宗伯群諸儒紳大爲校訂，頒佈海宇，傳之無窮，亦足以彰我明千古來同文之盛治也，誰復問中西哉？

由此可知，王徵認爲本書之最大價值在於：一日之內熟記五十個音符，即可以掌握聲韻，而傳統的方式則需要學習三年，如此可以大大的縮短學習聲韻的時間。

《西儒耳目資》爲何而寫？

就前所討論，則《西儒耳目資》對當時來華之西人和國人，皆有助益。然而，除了學習語言和了解聲韻外，是否還有其他更重要的目的？

不過，對於《西儒耳目資》的出版動機，王徵還有不同的想法。當時張敬一致信王徵稱：「今之耳目資或總不能越我音韻已傳諸書之範圍，即間出巧法，想皆此中所已備者。君獨何嗜之偏，而必欲授之梓？」，王徵回覆稱：「名理如淵正匯字學之海，學海不澄，名理奚自而流？西儒殫竭心力，急急成此書者，政欲資之。噍閱此中文字，可爲後來翻譯西學義理之淵海耳。」可見出版《西儒耳目資》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以此作爲翻譯西學著作的工具書。

同時，王徵在〈西儒耳目資釋疑〉中，對於此一聲韻系統，亦發展出擴充性工作，王徵指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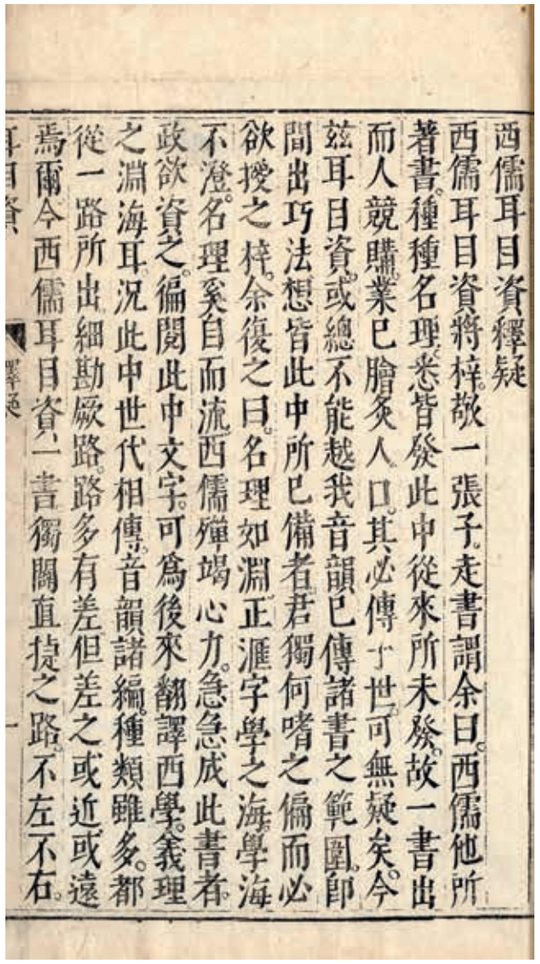
> 願天假餘閑，期與二三同志，更將此書第三邊正一譜，就依西儒所訂所排之序之法，一一檢《韻會》，小補所注音義，大書其字而細釋之，第務摘其切要，刪其繁蕪，益補續志其所未備。再于大書眞字之下，並搜草字、隸字、篆字，一同列之，尤爲絕唱。

可見，就王徵之見，將字學和韻學統合成一部完整的字典，是他對此書未來的願景。

利瑪竇與西書翻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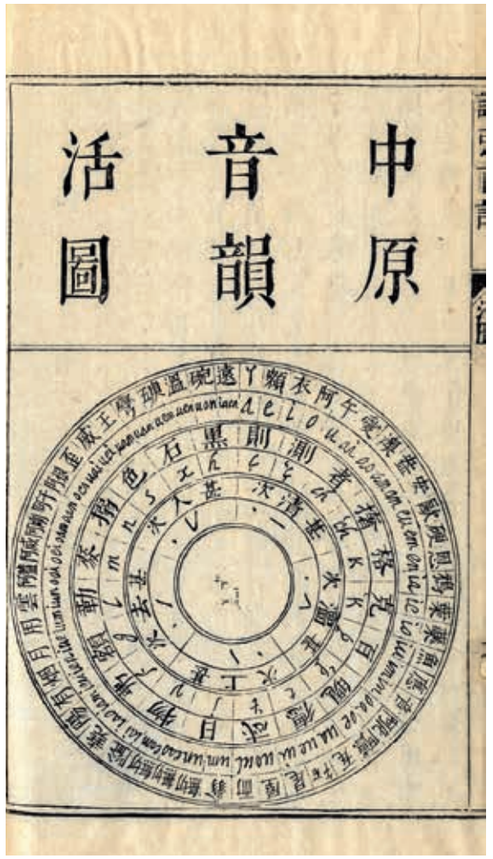
然而，來華的傳教士們究竟有什麼樣的翻譯計畫，需要體系完善，包含一萬四千字的韻書呢？這就與利瑪竇的遺願有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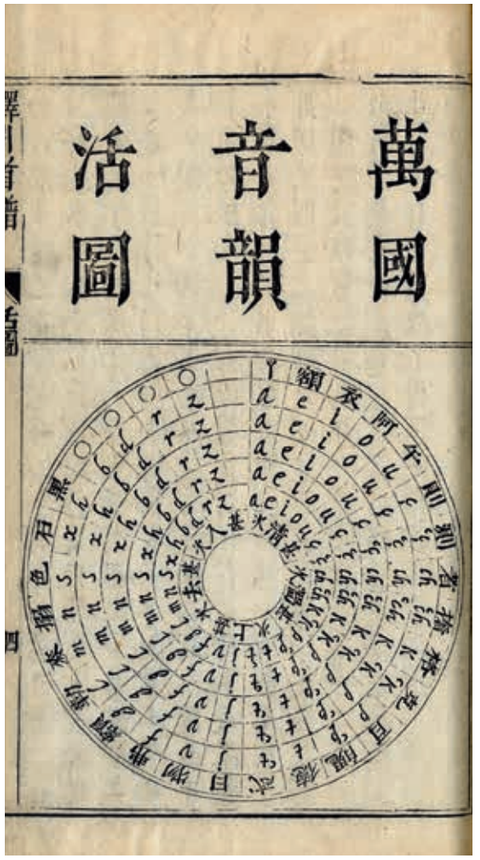
《西儒耳目資》的王徵書牌


王徵所撰寫的〈西儒耳目資釋疑〉

耶穌會士艾儒略（Giulio Aleni, 1582-1649, S. J.）所著的〈大西西泰利先生行蹟〉，指出利瑪竇曾以書信請求派遣傳教士，並多攜西書翻譯。萬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金尼閣返回羅馬，由教宗保祿五世（Paul V, r. 1605-1621）頒賜大量書籍。萬曆四十六年（一六一八），金尼閣攜帶了七千餘部西文書籍和二十名傳教士來華，其中包括了鄧玉函（Johann Terrenz, 1576-1630, S. J.）、傅汎際（Francisco Furtado, 1589-1653, S. J.）、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 S. J.）和羅雅谷（Jacques Rho, 1592-1638, S. J.）等人。（註七）七千部書中第一部被翻譯出來的，即是天啓七年（一六二七）刊印的《奇器圖說》。

據方豪神父在二十世紀上半的統計，北堂圖書館現存藏書中，確知爲金尼閣所攜帶入華者，共有四二八種，不確定者一五一種。這批藏書據惠澤霖神父（Hubert Verhaeren, C.M.）的說明，具有以下特徵：紅皮書面，書口塗灰藍色，書脊雙線裝訂，前後書面有教宗及耶穌會會徽之金印，版本較大，無其他藏書家之印或題字，刊印於一六一五年等等。尚有其他非教宗所贈之書。爲使後續來華的耶穌會士能夠快速掌握漢語，進而翻譯西書，實爲《西儒耳目資》出版的另一動機。


〈中原音韻活圖〉


《西儒耳目資》的〈萬國音韻活圖〉

《西儒耳目資》與中國聲韻學

《西儒耳目資》分爲三編：第一編〈譯引首譜〉，介紹萬國音韻與中原音韻兩個音韻系統。「萬國音韻活圖」是以七環同心圓，最內圈爲聲調、內五圈分列二十九個拉丁字母來代表元音，其中五個爲自鳴，二十四個爲同鳴，最外圈爲代表語音的漢字。可以轉動圓盤任意組合字母拼讀音節。「中原音韻活圖」，則爲六環同心圓，內兩圈爲聲調，中間兩圈爲二十個聲母對應的漢字和拉丁字母，最外兩圈則是與五十個韻母對應的漢字和拉丁字母。當轉動聲母圈、韻母圈和聲調圈時，就可以出現不同的組合。第二編〈列音韻譜〉則是按照拉丁字母拼音順序排列漢字，便於查找。第三編〈列邊正譜〉按照漢字的部首筆畫排列漢字，查找拉丁字母拼音。

語言學家歸納，《西儒耳目資》共採用了二十九個字母，組成了五十個韻母（五個自鳴字母，二十二個自鳴二字子母，二十二個自鳴三子孫母，一個自鳴四字曾孫母），二十個聲母（同鳴字父），和清濁上去入五聲，及甚、次、中三音。共羅列了三三五個漢字音節，附加八個聲調，合計約一四〇九個音節。（註八）《西儒耳目資》承繼了《葡漢辭典》和《西字奇蹟》的拼音基礎，發展成爲體系精確，便於查找的聲韻工具書，爲傳教士的漢語宣教工作，提供了效率和便利。

結語

語言學家羅常培先生曾說，由於各時代流傳的韻書沒有字母式的音標作研究的根據，因此無法考定音質。（註九）而耶穌會士金尼閣在前輩利瑪竇等整理中國語言經驗的基礎下，所撰作的《西儒耳目資》，無疑的填補了這個重要的空白。《西儒耳目資》不但透過用羅馬字母分析漢字的音素，使得繁難的反切系統，被大幅簡化，且在今日仍可以推知當時的南京官話發音；同時，也影響了當時的音韻學者方以智（一六一一～一六七一）、楊選杞（生卒不詳）和劉獻廷（一六四八～一六九五）等人。它更是當代各種漢語拼音方式的鼻祖。

明末的西書翻譯事業，本可與佛教東傳之譯經活動相提並論，當世推動之耶穌會士，亦有此想。在教宗保祿五世的支持下，金尼閣海運大量的書籍前來東方，並招募耶穌會士加入翻譯工作。艾儒略亦著書《西學凡》，介紹西方中世紀理想的大學教育體系。期盼基督教文明能在中國深耕茁壯，以達到宣教的目的。不論是訓練傳教士學習中文，亦或是將西書中譯，都必須查找字音，需要一基礎的語言工具書，《西儒耳目資》無疑是明末清初西學東漸下，龐大文化移植工作所需的重要語言學基礎。而中國士人之重視與刊印，並有意與字學合併，則爲無心插柳之舉。

作者任職於本院圖書文獻處

註釋

1. 董海櫻，〈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初西人漢語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一一，頁五五—五七。
2. 利瑪竇撰，〈利氏致巴都阿德富爾納里神父書〉，一五八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於澳門，載羅漁譯，《利瑪竇書信集》，臺北：光啓出版社，輔仁大學出版社，一九八六，頁三一。
3. 《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初西人漢語研究》，頁六二—六四。
4. 張緟芳，〈刻西儒耳目資〉。
5. 黃一農，一九九六，〈明清天主教在山西絳州的發展及其反彈〉，《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六期，頁一—三九。
6. 張問達，〈刻西儒耳目資序〉。
7. 方豪，〈明季西書七十部流入中國考〉，載《方豪六十自定稿》，臺北：臺灣學生書局，一九六九，頁二九—五四。
8. 《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初西人漢語研究》，頁八四。
9. 羅常培，〈耶穌會士在音韻學上的貢獻〉，載《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〇四，頁一五一—一五八。

參考書目

1. 金尼閣撰述、韓雲詮訂、王徵校梓，《西儒耳目資》，明天啓刊本，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2. 何高濟，王尊仲、李申譯，何兆武校，《利瑪竇中國札記》，北京：中華書局，一九九七。
3. 朱維錚，《利瑪竇中文著譯集》，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二〇〇一。
4. 董海櫻，《十六世紀至十九世紀初西人漢語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二〇一一。
5. 裴化行，管震湖譯，《利瑪竇神父傳》，北京：商務印書館，一九九八。
6. 方豪，《中西交通史》，臺北：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一九八三。